

沈志华

著

大国沧桑十讲

沈志华 演讲录

解读原始档案，重建历史事实

沈志华演讲录

沈志华 著

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沈志华演讲录 / 沈志华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5.6 (2019.4重印)

ISBN 978-7-5108-3653-4

I. ①沈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国际关系史—欧洲、亚洲—文集②国际关系史—东亚—文集 IV. ①D850.9-53
②D830.9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5238号

沈志华演讲录

作 者 沈志华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23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5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653-4
定 价 58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编者说明

从尘封的档案材料中追寻历史的本来面目，是历史研究者的一项重大使命。只要有了史料，学术研究就有了基础。无论时间怎样流逝，世界局势如何变迁，关心历史的人总能通过这些材料走进真实的历史。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的沈志华教授认为，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，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构历史。重构历史必须从个案做起，先搞清楚基本的史实，再探讨其背后的理论问题，这样对历史的理解才能不断加深。

然而，档案材料是普通读者很难接触到的，学术研究的大部头著作也不便于日常阅读。此时就需要学者通过报告、讲座、演讲的方式，以最平实生动的语言，将研究成果的精华，普及给更多的历史爱好者。这种形式更加直观，更有利于我们掌握了解历史的方法，也有助于我们扩大观察历史的视野。

作为历史研究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，沈志华教授近年来在中直机关及各大高校讲演数十场，就整个 20 世纪的中苏关系、中朝关系、

朝鲜战争、苏联兴衰的历史启示等等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。我们将其中有代表性的演讲实录整理归类，编选成书，以期将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分享给更多的大众读者。

最后，本书附录中列出了沈志华教授二十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。如果希望更全面准确地了解沈教授所掌握的档案与史料，以及他对于历史的更多深入看法，请阅读他的论著。

代序：在档案中找寻真实的历史

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，历史研究就是这样。极而言之，历史学的根基就是史料学。因为只要有了材料，学术就有基础了。正是因为从事俄语的人少了，研究苏联的人少了，你才需要花大力气去把那些特别重要的材料翻译出来，所以当时我就想着我得重写苏联史。以往的苏联史受政治风向的影响太大，有很多不真实甚至是“虚假”的历史。历史学家的责任是研究历史，你就不能人云亦云，你就得客观。

历史研究也不是谁对谁错，谁好谁坏，但是要把史实弄清了。要弄清史实，前提不就是这个档案吗？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先做档案。只要档案在，迟早是有用的，你只要这些东西放在这儿。慢慢的，你不看他看，中国这么大，人有的是，总有人关注、有人研究。所以我觉得档案是比较重要的，特别是你先把这些材料收集来，翻译出来，将来即使不懂俄语的人，他看这个也是有用的。

要读懂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特殊逻辑

沈志华：说到社会主义联盟结构的问题，应该说，任何一个同盟内部都会出现分歧。这很简单，因为大家利益不一样，即使是同

盟，但是还是各是各自的民族，各是各自的国家，理念不一样。但是凝聚同盟的一个核心是利益，利益就是可以分割的，可以让步的，可以谈判的。一旦发生分歧的话，大家坐下来谈，大不了你让我一点，我让他一点，最后解决分歧，同盟继续存在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核心不是讲利益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。

如果是利益的话，中苏就不会发生分裂了，你看1959到1960年苏共中央内部讨论的报告，还有中共中央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，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，说中苏根本利益是一致的，中苏的团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，如果中苏分裂，社会主义阵营就要瓦解，都认识到了，但还是要分裂。

记 者：为什么呢？

沈志华：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，存在着两个矛盾的现象，这两个矛盾的现象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。我们讲的是国家关系，讲的是国家关系机制，一个现象是国家关系本来应该是平等的，就是现代国家，不是说封建国家，从现代民族国家这个角度讲，要不然联合国为什么要投票，一人一票，你美国也是一票，一国一票，它就体现一个基本的平等原则。至于能不能实现，到什么程度，这是另一个问题。但是它原则是这个，社会主义国家原则上就不平等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共产党原来不掌权，还有在野党，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了关系，叫党际关系，党和党之间的关系。党和党之间的关系通行一个什么原则呢？是下级服从上级，全党服从中央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党纲上都有这一条，苏联共产党、中国共产党都是这样，原来都是什么？原来都是共产国际的成员，共产国际是一个国际组织，然后中国是它的一个支部，苏联是它的一个支部，它原来内部的关系是这么一种关系。

但是到了“二战”以后，一些共产党慢慢都掌权了，苏联、东欧，它就形成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党际关系又管着国家关系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，特别从40年代后期，从苏联、东欧，到50年代的中国、朝鲜、越南这几个亚洲国家，到整个60年代的时候，人们的理念都没转过来，首先是党和党的关系，中国跟苏联的交往，通过外交部也是一个渠道，但那是辅助的，主要是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，它们俩的来往就像兄弟俩一样，缺乏现代国家关系的准则。

中苏之间闹矛盾，中越之间闹矛盾，中朝之间，苏联跟南斯拉夫，苏联跟匈牙利，都是这个问题，就是好的时候不分你我，一旦关系不好就是你死我活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准则是模糊的，不明确的。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，没有一个平等的概念。慢慢地过了十年，到70年代、80年代就明白了，所以在那个时期，社会主义同盟瓦解的时候，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就不存在了。

记者：这个是不是也跟什么东西有关系，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是苏联输出革命才有建国，越南实际上跟中国输出革命是有关系的。

沈志华：对，跟这有一定的关系，不是根本性的，因为输出革命这是另一个问题了，你原来帮助过他嘛，你领导他好像是在情在理的，就像毛泽东说的，你们是老师，我们是学生，你们先走一步嘛。这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，谁也没说是两个国家，你是老师，我是学生。所以党的关系向国家关系过渡的这一段时期内，也就是在40年代到60年代这二十年的过程当中，它无法解决这个问题。

实际上，上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专题研究的主题了。

苏联解体之后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重构历史事实

沈志华：那么，我为什么要从专题史入手呢？

其实这个我也是有很深的考虑的，因为整个历史要重构。我觉得从苏联解体以后，历史学家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重新描述历史。我指的是现代史，不是说唐宋元明，那是另一回事，古代史研究原来也受影响了，不是说完全不受影响，但是少多了。那个文献都在那儿摆着呢，《二十四史》、古人的东西都在那儿。但是苏共的历史因为档案文献的缺乏而不知其真实面目，甚至有些都是被掩盖、歪曲的。

记 者：需要改写一下。

沈志华：也不能说是改写了，因为改写就是原来有一个东西，它给改了。实际上很多就是捏造的。所以苏联解体以后，大家都在争论谁的责任、为什么解体的时候，我认为不应该争论这个问题，因为很多事实都没弄清楚。我记得我从1993年回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以后，1994年我在深圳召开了一个苏联史的讨论会，那是我出的钱，但讨论的都不符合历史的真实。

记 者：基本史实不对。

沈志华：基本没有谈史实，大家都是凭逻辑在那儿争论，全是认为戈尔巴乔夫叛变，根据什么呢？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这个党，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这个权力，他是共产党的叛徒，然后又追溯到赫鲁晓夫就开始叛变。几千万人的一个党，他一个人就能决

定？这在逻辑上不通，再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你听来听去都是逻辑，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过来的？讲不清楚，谁也说不清楚。所以我的一个想法是，现在争论这些没意义，大家可以开阔开阔思路，想想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讨论，这样开一次会就够了，大家畅谈畅谈，关键是回去干什么？你得踏踏实实坐下来看材料，把一个一个事儿搞清楚，从十月革命前开始研究，俄国资本主义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？列宁当时的判断对不对？十月革命到底怎么回事，是不是武装起义？一党专政什么时候建立的，开始是不是这么想的？后来为什么取消立宪？你得把这些事的史实从头搞清楚，它自然就会回答你这个问题，在大家认同了基本史实的这种情况下，才可能产生争论。

比如说俄国布尔什维克怎么成功的？靠德国的帮助，怎么靠德国的帮助呢？如果大家从一个基本史实出发就会弄清楚，就是拿了德国人的钱，因为德国当时两线作战，这边要跟英法作战，那边要跟俄国作战，它为了避免军力分散，为取得一次大战的胜利，它就希望跟俄国单独媾和。当时临时政府没有一个党派敢拍这个板，你怎么能够单独媾和？你们原来是同盟，打一个敌人，私下媾和了，你这不是叛变吗？好，布尔什维克说我敢，只要我上台我就跟你单独媾和。德国人让列宁赶快回国，弄一个车厢把他们送去，给钱，回去闹革命，成功了。

这就签了《布列斯特和约》，那会儿我们学苏联史，我就老弄不明白，为什么列宁非要签这个《布列斯特和约》呢？党内都反对，从上到下没有人赞成，他非要签。为什么？他跟人家之前达成协议了。

就类似这样的事儿，你这点事儿你都不弄清楚，你说你争来吵去，吵什么呢？多了，就随便提一个，这苏联史里头，随便提一个事儿都没闹清楚，斯大林怎么死的，列宁怎么死的，别提了，简直

就是谜团重重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原来他们把历史都给遮蔽了，苏联写苏联史是三卷本吧，《苏联通史》，国内都使用那个，苏联早给包装好了。所以我觉得搞苏联史，第一个任务就是重建历史事实、重构历史事实。

重构历史事实怎么做呢？必须从个案开始做起，就是你把一件一件重大的事，方方面面的，军事的、外交的、文化的、宗教的、教育的，大家分工能够这样去做的话，最后才有可能构成一本通史。要把基本的史实搞清楚，我们再来探讨背后的理论问题，这样对苏联史的理解才能不断地加深。所以我觉得先做专题史是必由之路，你只能这么做。否则怎么做呢？如果出版一本苏联通史，不是不可以，但肯定是比较肤浅的，比较表面化的，因为很多事儿都没弄清楚。

而且现在俄国本身的档案馆是紧缩了，但是它出的档案集还是很多的，材料还是很多的，这个是很有空间的。我是希望更多的人来研究苏联历史。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，俄国又是个大国，又在你的隔壁，你又跟它那么近，过去跟它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没有理由不好好研究。

史实是攻不破的，专题研究一定要有立得住脚的证据

记者：我们看《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》这本书中记述的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始末，还有苏联“大清洗”之类的问题，它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从人性或者说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上，影响了苏联的声誉，或者说影响大家对它的看法。把这些东西暴露出来以后，肯定会对中国人有所冲击。您认为有冲击的话会是在哪些方面？怎么保证在学术范围内？

沈志华：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，一个是你的目标，你要追求什么目的；第二个是效果，能不能从正面引导。

从目的来讲，我觉得我只是把真实的历史写出来，我可以平实的语言表述它，你看我写的东西比较平和。我不主观地给它戴一个什么帽子，给人家盖棺定论。我就是费点苦功夫，把那些史料找到，然后把它们串起来，以来龙去脉告诉你怎么回事，其实毛泽东去跟斯大林谈判，到莫斯科就是这么回事。

史实是攻不破的，或者说我的努力让你攻不破。为什么我下这么大的功夫，就是这个目的。你看我最近写的这本书，我写完了，七十万字，其中大概有十几万字都是注释，每引一段他们之间的谈话我都做了考证，从哪儿来的，是谁说的，可靠不可靠。我觉得现阶段的苏联史就是要做好实证研究。

我觉得你把史实给它摆出来就可以了，大家都可以据此进行思考，其实最难的是把这个事实弄清楚。你看我从1993、1994年到现在，十几年了，发表了几十篇东西，基本上都是把一个事儿搞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。最近我刚写完一篇“赫鲁晓夫和炮击金门”。苏联到底与1958年的炮击金门有什么关系，这个材料你就要到处去找，到处到档案里面去摸，把相关的东西搞清楚，最后我写这篇东西用了中国、俄国、美国和台湾地区的档案。现在发现你不这么找多方的档案去印证，真是搞不清楚这个事。

你把这个事写出来，它能说你写的不对吗？别人要想跟你争论，他也得去看看你看过的那些材料，那他就跟着你走了，他就进入这个实证研究的领域范畴了。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更好了，所以我不怕，到现在没人来跟我争，因为他不愿意下那功夫。你能说我写的不对吗？你能说毛泽东没说这句话？你说斯大林没说这句话？都说了。

我说毛泽东是赞同批判斯大林的，原来大家都说中苏分裂是因

为毛泽东反对批斯大林。我说不对，毛泽东心里高兴着呢：可搬掉了心里的一个大石头，谁压的我？就是斯大林，这个石头可被搬倒了，而且不是我们搬倒的，是苏联自己搬倒的。这话都是毛泽东自己在党内讲的，你说他没说过这个话吗？那你拿出证据来。我有证据，从哪儿引的，哪儿发表的，你可以跟我辩论。你辩论不过。我不是说你没这个本事，我是说你不愿意下这个功夫，你要真愿意下这个功夫，太好了，大家一块儿做学问，多好啊。

而且，从大环境来看，我也觉得现在历史学家多做实证研究是比较聪明的一个办法。何况从学术上讲，我们现在也不具备条件，基本史实还没弄清楚，你在瞎吵什么啊？

其实历史就是发现，你不断地去发现新的东西。你怎么能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，一个就是学术嗅觉，另一个就必须有站得住脚的核心史料。我现在有好多文章没写下去，就是我觉得缺核心材料。写着写着，或者有想法了，列一个大纲给扔那儿了，因为缺核心材料。

不合逻辑的历史事件就很可能有问题

记 者：您一般怎么选某个研究选题？

沈志华：我一般是先提出问题和提出怀疑，有些事你看不大合逻辑，可能背后就有问题。我觉得这个是做学问应该这样的，因为你不提出问题，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，你没有一个问题意识，怎么可能深入下去？大有大的问题，小有小的问题，即使一个具体的史实也都是这样的。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道理，大家原来都说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是中国起草的，那时候我就想不可能啊，中国哪有那么多的外交经验，苏联又是老大哥，怎么会中国先弄出一个

文本给苏联？按道理应该苏联弄个文本给中国，但是史书都是那么说的。

记 者：是。

沈志华：我在研究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签订的时候，就特别关注这一个问题。类似的文件还有很多，不光是这一个，就是举一个例子。后来我把俄国的档案都拿出来一看，苏联第一稿在1月6日就起草好了，那个时候周恩来刚刚离开北京，还在路上呢，等周恩来到了莫斯科的时候，苏联已经改出七稿了，一稿改了给外交部，外交部又给了莫洛托夫，莫洛托夫又给了斯大林，改来改去，给中国的时候是第七稿，这怎么能说是中国拿初稿给人家？

但是后来我想，因为《毛泽东传》上也这么说，他们文献也这么讲，后来有人拿了一个毛泽东的电报出来，毛泽东的电报里头说，中苏条约是我们起草的，苏联改动不大。这就提醒我们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，还要继续再深入往下研究。再往后研究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：就是苏联把这个稿子给了中国，中国改了改，改了以后把改的稿子又给了苏联，苏联就没改，说“行，就这个了”。毛泽东的电报里面没说前面这个事儿，就说后面这个事儿，苏联拿了我们这个文本没怎么改，就通过了，那是人家给你的，你改动了一点，改动也不大，又给了苏联，苏联同意了。就是这么回事。

但你再进一步想，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？这里边的问题就大了，他不是不知道这个过程，但他为什么前面的话不说呢？这就是毛泽东去的时候压力非常大，因为很多人不希望他去苏联。再一个，你到人家那儿，人家拿一个协议给你，说签字吧。这就更不得了了，中国共产党的脸面何存啊？所以不能说苏联起草了条约这个话，而

说是我们起草的稿子。你就分析他的心理，把整个史实铺开，这样子事情就比较明白了。

这里没有价值判断，事实就是这样，他的压力很大，他不希望回国以后再面临一些问题。革命成功以后的中国共产党，还要领导全中国，再加上那会儿对苏联都不满，国内是这样的情形。基本上都是这样，因为不论是苏联史还是中苏关系史，里边的问题非常多。

所以首先要有问题意识，然后你就要去小心做了，慢慢地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细。你看我的几篇文章能够感觉得出来，我对比各方面的材料，一点一点去抠，我甚至在研究波匈事件的时候，都是按分钟计算的，因为一个情报谁先得到是很关键的。是苏联人先得到还是中国人先得到，若中国得到，中国这个电报什么时候发的？发出来的时候是莫斯科的时间，还是布达佩斯的时间？在北京是几点钟？然后北京收到之后的处理还不一样，它电报先发到外交部，外交部先要解密，解密以后变成中文，中文还要再送中央处理，然后再回电。

所以你看档案的时候，你就不能看几月几日发出，那不行，你得看几月几日到。至于档案里细到什么程度，我举个例子。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，中国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为什么？原来外交部档案没公开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里有点问题，因为中国没什么反应，就是23到26日的时候，10月23日晚上出的事，到26日中国报纸上都没说，都是转载别人的。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会儿外交部的档案没公开，但是我就采访了很多人，特别是我采访夏道生。他当时在那儿，他说我没电报机，也没有长途电话，所以跟国内断绝通讯。他说我们发电报得到电报局去，电报局那天闹事儿就关门了，就这么简单。

记者：所以一开始中国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个事。

沈志华：一开始中国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然后外交部档案开放了以后，我又去求证这个事，因为这毕竟是当事人口述的，在历史研究当中口述材料一定要有文献来佐证，特别是比较重要的问题。后来我就发现果然是，24日凌晨，驻匈使馆发出电报，不错，写的是24日，他写电报的时候写好了，他一直发不出去啊，不是着急嘛。外交部什么时候收到的？27日收到的。这不就清楚了嘛，这就是文献和口述材料就能够吻合了。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根据。中国不知道匈牙利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一开始中国没有作出反应，这就是我做的一个结论。

后来中苏吵起来了，中国就说匈牙利都是我们的功劳，都是我们让出兵的，其实中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说一定要特别小心的求证，类似这样的。包括几点几分的时候，后来我做卡片的时候，都给标上几点几分收到，要不然很容易造成失误。从方法上来讲，我觉得做这个实证研究，我也有自己积累的一套方法，我觉得我这个方法很不错。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，一般的历史研究者都会涉及到方法的问题。

做学问就得下苦功夫，史料还要有甄别分析

记者：对，我也有这个问题要问。

沈志华：面对浩瀚的史料，方法其实也很简单，我觉得做研究能成功没有窍门。

第一，你得下功夫，谁也不比谁聪明到哪儿去，都差不多。我就是比别人下的功夫多一点，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，我工作十六个

小时；你一天工作五个小时，我工作十三个小时。我比你多一倍的时间，那么你干一年，我等于干两年。所以第一要坐得住，要坐冷板凳，肯于下功夫，这是一个起码的条件。搞历史的走捷径不行，历史不是想出来的，是看出来的。你得看材料，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，怎么可能想出来一件事呢？道理可以想出来，史实想不出来的，史实是看出来的。

所以它就需要你去看大量的材料，你不看，那你就蒙自己。如果实在没有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至少我对这个事情判断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，我必定要把它找来看。就是人家都写了，你都不敢信，你都要找原件去看看。做学问要不下这点苦功夫，不可能做到有多好。当然有人很聪明，东抄西抄点也行，不是不行，但是你做不真，做不实，迟早会做不下去。我可以随时举很多例子，你看张三写哪本书，你觉得这个挺重要的，抄下来了。其实看所有别人的著作，就是给你一个引导，就是给你指个方向，告诉你这儿还有这么一个材料，但是不是这个材料就是他说的这样，那可是两回事。

你一定要去找那个原件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很多不是别人理解错了，就是引用片面，有的可能犯小错误了。比如他页码标错了，你不看你也照标上，你倒是省事儿了，他的错误不就传染给你了吗？姑且不说什么道德的问题，至少他的错误像病毒一样传染给你了。如果大家都这样，还做什么学问，咱们就被“禽流感”传染完了，这是第一。

第二，方法得当。方法得当，你就事半功倍，方法不得当，你就事倍功半。我也自己总结出一套比较好的方法，我也比较得意。我这个方法也给我的学生们讲，我觉得搞历史就应该这么做，这么做就能够让你理清史料的继承关系，来龙去脉。很简单，我就是做卡片。其实这是中国史学家的传统做法，我只是利用了现代的技术。